

# 書寫慈濟的身體

陳淑娟

佛光大學社會學系

*Charisma and Compassion: Cheng Yen and the Buddhist Tzu Chi Movement.* By C. Julia Hua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41 pages.

2010年9月8日，早上9點50分。電視上，慈濟的大愛台正播放著證嚴法師的開示。畫面上，證嚴一席灰色僧服，充滿情感的語調正說著：「……時時多用心」；「心」字的尾音拉長著。隨著法師開示內容，畫面也轉為慈濟志工在世界各地的國際人道救援紀錄。在台灣社會，「慈濟」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佛教團體。對一般台灣民衆而言，提到慈濟，通常就會想起，一些身著深藍色上衣雪白色長褲的慈濟人，在各種災難現場來回穿梭，為災民遞送物資或是煮食的景象。證嚴所領導的慈濟功德會，不但是台灣宗教界的傳奇，也是一個以各種社會慈善活動聞名於世的現代佛教團體。而黃倩玉教授（C. Julia Huang，以下簡稱Huang）所著的 *Charisma and Compassion*，便是一本探討證嚴領袖魅力與慈濟海內外發展的民族誌研究作品。

證嚴在1966年創立慈濟功德會，這個以慈善志業為主的草根性宗教團體，到了1990年代，已成為台灣最大的正式組織。在短短的50年間，慈濟從一個地方的宗教團體發展成為跨國宗教，在33個國家設有分支機構，擁有六百萬信徒。慈濟體系在2000年時掌控約莫新台幣120億元的專款，目前在台灣除了基金會之外，擁有三所綜合醫院、一間電視台及一所綜合大學。慈濟為何能夠發展成為一個如此龐大的組織體系？證嚴在慈濟的發展過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Huang以其身為人類學家的特有反思能力與細膩筆觸，為讀者娓娓道出慈濟

的故事：這個本是在地的草根性團體，如何以其理性化組織，結合證嚴的領袖魅力及佛教的慈悲，逐步擴展成爲信徒遍及全台規模的宗教組織，再進一步發展爲一個全球宗教。Huang 認爲，慈濟作爲一個成功的宗教運動，主要在於它駕馭了情緒與規訓，二者以辯證方式在宗教 Charisma 運動中得以建制化。Huang 並提出一個「三身」模型，用來分析證嚴領袖魅力的體現，以及這種領袖魅力如何維繫慈濟信徒並鞏固組織體系的發展。Huang 指出，慈濟此一具宗教領袖魅力的運動，主要透過領袖之身（證嚴）、追隨者之身（信徒），以及集體之身（以情緒連帶爲基礎建立的社群）這三個層次的「身體」機制，使證嚴的領袖魅力得以貫穿慈濟在地方、國家及全球三個層次的運作。證嚴的領袖魅力透過三身的體現，影響並維繫著慈濟人的認同以及慈濟組織體系的海內外發展。

如書名所示，*Charisma* 是指證嚴的領袖魅力，<sup>1</sup>*Compassion* 則是指證嚴所領導的慈濟團體在各種社會實踐背後所秉持的佛教慈悲精神。德國社會學家 Max Weber 是第一位提出 Charisma 理論的學者。但是 Huang 使用 Charisma 一詞來指稱證嚴在慈濟體系中的影響力時，雖然略爲提及 Weber 的 Charisma 意涵，但其論述主旨，似乎不在與 Weber 的理論進行對話。Huang 的論述重點，主要是圍繞在學者們討論 Weber 的 Charisma 時重覆出現的三個議題，再把這些議題結合到她對慈濟的考察。第一個議題是有關 Charisma 的價值與變遷，即 Charisma 可以是社會的創新來源，促使社會變遷的動力，但是 Charisma 在多大程度上是變遷的主要動力？個人的 Charisma 在多大程度上與建立的制度相衝突？在此，Huang 想了解，證嚴的魅力爲何可以在慈濟龐大的組織體系內延續下去。另一個議題是文化的問題。Huang 認爲 Weber 的理論受限於二元對立的預設，無法解釋強調規則戒律的佛教概念下的領袖魅力來源（如比丘、比丘尼），因此也無法

---

1 本文使用黃倩玉教授對 Charisma 的中譯「領袖魅力」；但是在文中提及 Weber 及相關討論時，則直接使用 Charisma 一詞。

用來解釋慈濟的例子。第三個議題則是思考 Charisma 如何在比較的脈絡中運作，以及因此可能出現對於 Charisma 一詞的重新概念化。Huang 認為慈濟是一個有關領袖魅力的有趣案例，因為它是以女性為主的領導關係而且是理性規訓的大乘佛教傳統，這讓慈濟的領袖魅力現象超越了以往用二元性特徵來解釋 Charisma 的理論。

作者在書中的問題意識為，信徒對證嚴領袖魅力的效忠，如何（以及為何）可以在個人情緒與組織三個層次（地方、國家及全球）的擴展及維持之間，產生互動關係。換言之，Huang 欲論證，慈濟這個具領袖魅力特色的宗教運動，在發展成為理性化的現代組織時，如何同時保留了信徒與其宗教領袖證嚴之間的個人連結。因此，作者主要考察兩個面向：一、證嚴的領袖魅力如何與理性的、龐大的慈濟組織體系相連？二、慈濟發展成為跨國的佛教運動，其背後所撐持的機制是什麼？在研究方法上，為了處理慈濟是否跨界變遷的情形，作者採用多點田野的方法，在台灣、馬來西亞、日本及美國等地進行田野調查。不過，以慈濟在全球擁有三十幾個分部的情況來看，Huang 選擇馬來西亞、日本及美國這幾個海外田野點的理由是什麼？是因為慈濟在這幾個國家的發展，正好代表慈濟的海外分部特色？或者，這幾個分部具有某種特殊性，所以值得加以觀察記錄，以凸顯出慈濟在海外發展過程中的複雜度？可惜 Huang 在書中並沒有特別說明田野地的選擇標準。

Huang 在全書首先說明證嚴的出家經歷以及創建慈濟的經過，並分析證嚴的領袖魅力。「領袖之身」體現為證嚴的高度領袖魅力，包括證嚴的外表、瘦弱的身體、說法時蘊含情感的語調，以及其慈悲的胸懷與實踐信念等。信徒在直接或間接見過證嚴後，往往受到感召，而決心追隨證嚴並積極投入慈濟的各種活動。證嚴的領袖魅力也展現在她對組織的影響力上，在分析慈濟的組織架構時，Huang 指出，儘管慈濟在形式上似乎是科層組織，但是實際運作時，證嚴本人的指導及作為最後的決策者，才是組織的運作核心。證嚴不只是精神領袖，也是這個傘狀組織體系的最後決策制定者(p.60)。Huang 認為慈濟是一

種領袖魅力型的組織，亦即，藉由減少科層規則並且讓這個體系個人化，領袖魅力的領導關係就可以被理性化成爲一個巨型的組織及科層體系。Huang 進一步分析維持領袖魅力權威的「地理身體」(p.83)的機制，在慈濟組織體系內有兩種運行方式：一方面是領袖魅力從中心流向各分支機構，另一方面則是信徒從海內外各個分支機構往領袖魅力中心的聚集。證嚴每個月定期從花蓮本部走訪台灣本島內慈濟各分會，這種「上人行腳」(p.83)活動維繫著信徒與證嚴之間的連結。此外，信徒也會走訪他們視爲家的花蓮總部（靜思堂），或是參與中心的相關集體活動；其中尤其是透過集體儀式如手語歌表演，慈濟人（慈濟信徒）凝聚出屬於他們共同的認同及集體情感，即Huang所稱的「集體之身或樂音之身」。

Huang 接著分析了哭泣及手語歌在慈濟文化脈絡中的意義，認爲這個領袖魅力運動的常規化，是由兩種極端情緒表現形式所構成的情緒結構。哭泣代表情緒的神入(ecstasy)，是個人自發性的情緒表達，信徒因宗教共鳴、領袖魅力的訴求、儀式、志工經驗以及情緒因素（責難、衝突與驚愕）等幾種情況，而有的哭泣經驗；手語歌則象徵情緒的形式化表達，它形塑了信徒的集體情緒（樂音之身）。這兩種情緒表達形式共同存在於慈濟文化中，代表的是這個領袖魅力的宗教運動理性化的努力。在這個過程中，從信徒此種自發的、不受控制的情緒表達，到手語歌的情緒結構，是作爲「領袖魅力運動核心的非凡、無我的情緒，已從無形式轉變成爲一致的集體情緒表達」（譯自p.152）。Huang 對於信徒的哭泣經驗以及慈濟的手語歌文化的分析，都有生動的描摹，甚至作者也略爲提及自己在參與觀察中的哭泣經驗。作者的書寫展現其身爲人類學家在田野中的獨特細膩觀察與同理能力。Huang 對於信徒的哭泣有幾種分類的解釋，包括：表達罪疚感與自憐、哭泣的感染力、贖罪、經歷領袖魅力情緒，以及證嚴的解釋等。或許我們還可以再問「慈濟的哭泣文化」是如何形成的？事實上，各個宗教對於信徒在各種儀式或活動中，應如何表達情緒？以及什麼樣的情緒是被鼓勵的？什麼樣的情緒是被壓制的？信徒如何學到

在何種情況下表達何種情緒？都有一套建構的機制，也就是所謂宗教的「情感文化」(Emotion Culture)。舉前述其中一種哭泣原因「感染力」為例，信徒不了解自己為何在某情境中哭泣：「我不知道我為什麼哭。我看到你哭，也看到她哭。沒多久，我就發現我自己也在哭」（譯自 p.138）。Huang 對此的解釋為，哭泣有其感染力。對於此種情緒的感染力，我們或許還可以思索「社會情境」對於情感表達的賞罰是否制約了當事人，此種情緒的社會交換論觀點；我們也可以用哭泣情境的社會心理因素來解釋。例如，如果信徒在哭泣情境中看到其他人在哭，自己並沒有跟著哭，其他人是否會給予情緒的負面懲罰，如：回以不贊同或是冷漠的表情等。就社會心理層面而言，沒有哭泣的當事人，心裡其實也會產生從眾壓力，因為覺得自己跟別人不一樣。社會學認為情緒的表達方式以及表達什麼樣的情緒，是社會建構的，是受社會情境影響的。慈濟文化中信徒此種「自發的哭泣行為」，並非發生在信徒單獨、私下的個人情境，而是在慈濟的各種社會情境當中。因此，不同的情境條件對於信徒的哭泣有什麼樣的影響？慈濟的情感文化與台灣社會的其他宗教有何差異？慈濟的情感文化是如何建構的？慈濟人有什麼樣的情感社會化歷程等，這些關於宗教與情緒的社會學問題，儘管不是 Huang 書中的論述重點，但是日後學者們在處理宗教中的情緒現象時，這些應是值得納入加以探討、思索的議題。

Huang 在書中隨後分析「追隨者之身」，即慈濟如何發展其地方組織以及信徒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體現「慈濟人」的身分。首先，Huang 注意到慈濟活動中性別的重要性。慈濟地方組織發展的過程中，婦女的傳教技巧與動員能力，扮演關鍵的角色。不過，女性在維護其慈濟人的角色時，往往比男性要來得複雜，例如，在選擇齋食方式以及遵守制服規定方面，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容易遭受家人的反對。Huang 分析指出，儘管禮儀對慈濟人（不分男女）而言是一個必要的特色，但是慈濟對女性的儀節規範，比較針對情緒管控，男性的儀節則比較針對身體規訓。其次，地方組織在形式及運作上有明確的領導關係及分

工。慈濟的追隨者之身是透過以下幾種方式體現出來：在恰當情境中恰當地呈現慈濟人的身分、藉由身體規訓、情緒管控以及道德層面來改變自己。慈濟這種在信徒身體規範上的性別差異，是否只是反映出台灣社會對於身體建構的性別差異？比如男性是理性的身體，而女性是感性的身體等，值得讀者進一步思考。

Huang 接著把慈濟放在台灣社會的民主發展歷程中，檢視其如何發展成爲非政府組織(NGO)以及其運作方式。第一階段從 1960 年代中期到 1970 年代晚期，慈濟是一個以女性爲主的地方宗教慈善團體。第二階段從 1970 年代晚期到 1980 年代中期，此時慈濟開始制度化發展，在當時戒嚴時期政府的支持下，透過信徒的捐款，在公共建設比較落後的台灣東部花蓮，建立了第一間醫院，Huang 認爲這是台灣社會集體道德努力的體現(p.191)。第三階段從 1980 年代中期至 1999 年，此時台灣社會經歷解嚴及政治轉型，在快速的社會變遷中，各種價值觀相互競逐。在這個階段，證嚴成爲政府當局及許多台灣民衆眼中道德高尚的宗教領袖，而慈濟組織體系也成爲濟世及人道精神的象徵。慈濟這個以社會慈善爲主的宗教體系，此時已發展成爲最大的非政府組織，具有高度的募款能力與動員能力。但是，Huang 指出，慈濟在這階段所建立的第二間醫院，因爲社會政治型態的轉變，在籌建過程中與政府之間的互動方式也有所調整。從 Huang 在書中的舉例分析，我們看到慈濟如何調整自己以適應台灣社會變遷過程中不同的政治情勢。

慈濟究竟是台灣或是全球的宗教？Huang 認爲，慈濟除了是台灣的宗教之外，也是一個全球的宗教運動。慈濟在 1989 年於美國成立第一個海外分部後，陸續在其他國家發展。到了 2000 年，已經發展成爲一個大型的全球非政府組織，在海外擁有以華人爲主要成員的分支機構。此外，慈濟的非政府組織身分，在 2004 年也得到聯合國的正式承認。Huang 的分析此時轉向討論慈濟爲何是全球的宗教運動，以及慈濟的海外發展如何有助於台灣人認同的建構。Huang 田野考察了慈濟幾個海外分部，包括日本、馬來西亞（麻六甲與檳城）、美國

(紐約與波士頓)後，發現慈濟在這三個國家的發展情況，有幾個共同點。首先，慈濟的海外發展是晚近約 1990 年代的現象。其次，這些機構的最主要成員是旅外台灣人，其次是旅外中國人。再者，分支機構的慈善活動並不只以海外華人為對象，這些分部的創辦人在成為慈濟人之前都是虔信佛教徒，而這些分部的出現都是源自於當地婦女們致力於回應證嚴領袖魅力的感召以及其對社會服務的重視。此外，海外分支機構與證嚴及台灣花蓮總部之間，藉著回台的各種「朝聖」活動——尋根或年度活動等，維繫著慈濟從在地出發進而擴展全球的網絡關係。Huang 在書中最後還特別以一章的篇幅來分析麻六甲分部的發展故事，認為其發展與運作方式，既是一種在地與跨國的實踐，同時也是領袖魅力的三身在全球層次上的體現。

目前雖然已有不少關於慈濟的中外研究成果，但是 Huang 的 *Charisma and Compassion* 一書絕對有其獨特的學術貢獻。首先，這本書提供讀者一種全面的觀點，從個人、地方、國家、全球四個面向來考察證嚴的領袖魅力及慈濟在海內外的運作與發展過程，是一本多層次分析慈濟現象的民族誌。其次，Huang 提出一個「三身模型」（領袖、信徒、集體）來論述領袖魅力的三個體現層次（地方、國家、全球），這是一種不可多得的理論及分析角度的創新。最後，Huang 以經驗研究來證明，領袖魅力的超凡情緒感染力，與理性的制度結構之間，不一定是衝突的關係；反之，在現代社會的宗教領域中，領袖魅力與理性制度之間，有可能以一種巧妙結合的方式並存。筆者認為，Huang 的三身分析模型以及其分析證嚴的領袖魅力與慈濟組織體系的關係之討論，是本書最重要的學術貢獻。